第 50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Vol. 50, No. 3
2013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May 2013

**文 献 学 研 究**

# 乾嘉考据学新论

漆 永 祥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摇**100871 )

**摘摇要:** 乾嘉考据学家虽然标榜汉学,批判宋学,但他们不同程度地有着宋学渊源与背景,对宋学并未全盘否定;乾嘉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之学,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是一种在膜拜《六经》、尊崇汉儒前提下的先验论;因为不擅科举,他们中的多数功名黯淡,过着"著述难为稻粱谋"的艰辛生活;尽管如此,他们也并非一味消极避世,而是有着可堪称道的"事功之学"。

**关键词:** 乾嘉考据学; 汉学; 宋学; 实事求是; 事功之学

**中图分类号:**I 206. 09**摇摇文献标识码:**A**摇摇文章编号:**1000-5919 (2013 )03-0104-08

## 一、乾嘉考据学家之宋学背景

清代考据学盛于乾嘉时期,然追溯其在清初之源流,则一般认为与顾炎武等人有密不可分之关系,即汪中所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①。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学术宗尚方面虽汉宋兼采,但也各有所主,业师孙钦善先生综论顾、黄、王三人曰:

> 从总的思想倾向看,王夫之和顾、黄一样,也是反对宋明理学的。但细分起来,三人还有些差别,即:顾炎武反对陆、王,修正程、朱;黄宗羲修正陆、王,反对程、朱;王夫之则宗师张载,修正程、朱,反对陆、王。②

也就是说,顾、黄、王诸人,无论其宗程朱抑或宗陆王,其根柢皆为宋明理学系统中人物。同时之张尔岐,其学亦"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袭语录"③。至乾嘉考据学家,自惠栋始,师法汉儒,标举"汉学",排斥宋学,几与宋儒划清界限,此世人皆知。然细考其学术渊源,实与宋学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不少学者有宋学背景,此则或为时人隐而讳之,或为后人所忽略不道。

例如,惠栋是高举"汉学"大旗的第一人,对宋代经学大加排斥,甚至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但对宋儒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却采取肯定的态度并树为楷模。即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④。而江永、戴震之学,本出自朱子故里,有深深的宋学烙印,江氏有《近思录集注》14 卷,《河洛精蕴》9 卷等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戴震虽然痛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但不废性理,以闻道为治学之终极目标。章学诚明言"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⑤。又如王昶"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言性道则尊

**收稿日期:**2013-02-26
**作者简介:**漆永祥,男,甘肃漳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①**摇**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 35《汪容甫墓志铭》引汪中语,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20 页。
②**摇**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886—887 页。
③**摇**钱载:《张处士尔岐墓表》,见《碑传集》,第 11 册,卷 130,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875 页。
④**摇**王昶:《春融堂集》,卷 22《为顾秀才千里广圻题其兄抱冲小读书堆图》,《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 1437 册,第 587 页。
⑤**摇**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7 页。

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阳明诸家”①。其从清军征川藏,襄赞机务,战事结束,“大兵久撤,幕府清闲,乃借《性理大全》、《语类》、《或问》、《王文成公集》读之,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行之要”②。又如卢文弨为桑调元婿,其自述称“弱冠执经于桑弢甫先生之门,闻先生说《中庸》大义,支分节解,纲举目张,而中间脉络无不通贯融洽,先生固以为所得于朱子者如是。盖先生少师事姚江劳麟书(史)先生,劳先生之学,一以朱子为归,躬行实践,所言皆见道之言,虽生阳明之里,余焰犹炽,而独卓然不为异说所惑”③。然则卢氏之学,初亦为宋学根底。又如邵晋涵,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详论其学术宗旨在宋学而不在于汉学。④ 刘台拱“十岁,心慕理学,尝于其居设宋五子位,朝夕礼之,出入里闬,目不旁睐,时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从同里王君雒师学,及见王予中、朱止泉两先生书,遂笃志程、朱之学”⑤。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无论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儒,虽然对朱子多有讥讽,对宋代经学与理学持否定的态度,但对宋儒立身致行之学并不否定,且见诸行事。当时并未出现“汉贼不两立”的绝对状态,有之则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始。皮锡瑞论曰:

> 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故惠、江、戴、段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摋。⑥

因此,乾嘉考据学家一方面坚主汉学,反对宋学;但同时对宋儒修身诚意之学并未全盘抹杀。惠栋曾说:“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荀卿称周公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⑦后人执此言以为惠栋不反理学,实际上惠氏所指理学指宋儒修身诚意之学。换言之,即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即他所谓“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一,非学也”⑧。此语可以认为是惠栋对上句话的最好注解。之所以提倡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倡;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的弊端。⑨ 这正是惠栋父子在立身制行方面宗尚宋儒的原因,也是惠氏将“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书为楹联而父子皆遵行不悖的思想背景和合理解释。明白此旨,我们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言行,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 二、乾嘉学者“实事求是”之局限

《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乾嘉考据学家远承汉儒,以“实事求是”为宗主,将其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如卢文弨评价戴震之学“精诣独造,以求至是之归”⑩。钱大昕更是大倡“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⑪。实事求是遂成为他们品量学术、评价时

---

① 阮元:《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碑传集》卷 36,第 3 册,第 1063 页。

② 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上乾隆三十六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27 页。

③ 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抱经堂文集》,卷 1《中庸图说序》,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0 页。

④ 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碑传集》,卷 50,第 4 册,第 1415—1418 页。

⑤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二集》,卷 2《刘端临先生墓表》,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揅经室集》本,上册第 399—400 页。

⑥ 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313—314 页。

⑦ 惠栋:《九曜斋笔记》卷 2“汉宋”条,清《聚学轩丛书》本。

⑧ 惠栋:《九曜斋笔记》卷 2“趋庭录”条,清《聚学轩丛书》本。

⑨ 惠栋撰,漆永祥整理:《松崖文钞》,卷 2《沈君果堂墓志铭》,台北:中研院文哲所 2006 年版《东吴三惠诗文集》本,第 345 页。

⑩ 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抱经堂文集》,卷 6《〈戴氏遗书〉序》,第 74 页。

⑪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 25《卢氏〈群书拾补〉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21 页。

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当时学者，最喜将训诂考据之实与空衍义理之虚相比较。如凌廷堪云：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①

同时阮元也有相类似的论述，阮氏云：

《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②

在乾嘉学者看来，其所谓"实事求是"，所针对的是科举时文之虚、理学玄谈之虚、佛道异端之虚与好名务奇之虚。即凌廷堪所谓"伪士不可以乱真儒也，犹之鱼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虚声不可以紊实学也，犹之燕石不可以冒良珏也"③。换言之，"实事求是之学"亦即"实学"，治经训诂，求学闻道，进而可推广至经国安邦，扶世济民。如阮元于嘉庆八年杭州奉御批云："经济必从典谟中推求，无不可办之事。"④考经研史，有益于世，这是从帝王至考据学家一致的观点。

但乾嘉学者言言有考、字字有据的"实事求是"之学，实际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首先，他们的"实事求是"是建立在对孔、孟与《五经》完全信赖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建立在对汉儒尤其是东汉如许慎、郑玄诸人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

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为"万世教科书"，圣人的权威与地位不容挑战与怀疑。乾嘉学者对诸经与旧注笼统视为同一思想体系来相互引证阐释。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引用《易》、《诗》、《乐记》、《中庸》、《大学》、《论》、《孟》及郑玄、许慎之说相互疏通证明，但这些书非成于一时，其思想意识各自不同，且诸书"理"字有其专义，并非同一意义上的哲学含义。正如孙钦善先生所言，"实际上不但六经之间，经注之间的思想内容不尽相同，就是孔孟的思想也是各有其特点的，决不应混同"。⑤

又如对于《诗经》的研究，乾嘉学者多遵从《毛传》与《郑笺》，视其为周公、文王教化之典谟。例如《野有死麕》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诱"《毛传》训为"道"，欧阳修释为"挑诱"，深得风人之旨。然戴震《毛诗补传》卷二谓"怀春者，设言女之情。诱之者，托言己之愿。……其吉士好色而不至于淫，其女子含贞一而不可犯干。诗于善兼之矣。"⑥钱大昕谓"言贞女有洁清之操，士当以六礼导行之"⑦。此种解释，较之欧阳修与明代公安、竟陵诸家，以解"五七言"之法而读《诗经》，更是一种曲解与退步，当然从经学史的层面而言，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乾嘉学者溯源而上，求儒学之本根，他们认为汉儒训诂释解，学有师承，去古未远，的然可信。如惠栋论曰：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⑧

又钱大昕论云：

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

① 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状》，第317页。
②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三集》，卷5《〈惜阴日记〉序》，《揅经室集》下册第687—688页。
③ 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4《辨学》，第34页。
④ 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嘉庆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4页。
⑤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第987页。
⑥ 《戴震全集》，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75页。
⑦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6《答问三》，第72页。
⑧ 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清省吾堂刊本。

> 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①

钱氏还认为,东汉复不若西汉经学之可信,其论《春秋》曰:

> 盖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多见于《论语》,西京去古未远,犹有传其学者,今所存唯东汉诸儒之说,而《春秋》之微言绝矣。②

孙星衍所论较钱氏为更详,他指出汉儒承上启下的重要性与其存古之功。其云:

> 汉代诸儒,承秦绝学之后,传授经文经义,去古不远,皆得七十子之传,若伏生、郑康成,其功在经学绝续之际,较七十子为难,又迥在唐宋诸儒之上。③

经学与汉儒的权威性不可动摇,则乾嘉学者治学,势必依经释解,缘汉儒之说为说,虽然在训诂考据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对汉儒之说多所纠正,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保守的而不是开放的。他们打碎了宋明理学的枷锁,抛弃了宋儒所维护之“道统”;但他们又戴上了汉儒经学的枷锁,维护着另一种“道统”。孙钦善先生曾论顾炎武曰:

> 他宗宋儒,法孔孟,带有卫道气息,排斥叛逆精神,远不如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开明。这种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清代正统考据学派中,一直沿袭下去。④

先生此言良是,无论是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还是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家,在思想上皆不具有梁启超所比喻的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性质,皆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而其“实事求是”,也是一种在膜拜《六经》、尊崇汉儒前提下的先验论而已。但无论如何,其治经诂字方面,因音求义,讲求本根,追源穷委,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其重知重行,不尚凿空、甘于寂寞的治学的态度;其不重玄谈,“寓义理于训诂之中”的治学理念;以及颠覆宋明理学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与经术治国的观念思想等,都给了后人以极大的影响。

## 三、著述难为稻粱谋

乾嘉考据学兴盛,世人推论其因,多归之于清廷禁书与文字狱所致。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话语言,后人常以为信史而引证之。陈寅恪曾谓清代史学不振,“未可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其论甚伟。然究其原因,陈氏复以为“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⑤ 依陈氏之说,则当时考据学家皆利禄之徒如汉代治经者,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者也。然如详辨当时考据家之情状,即知此说为不然。

即以科举功名而论,乾嘉时考据学家多功名黯然,屡败科场,其求生之手段,或入幕府,或修志书,生活无助,常困衣食者,在在而有,比比皆是。乾嘉学者多不擅时文,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中所列诸人而言,掇巍科者,以金榜为最,其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第一名及第,其次则王鸣盛为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江德量为乾隆四十五年恩科汪如洋榜、洪亮吉为乾隆五十五年恩科石韫玉榜一甲第二名及第,卢文弨为乾隆十七年恩科秦大士榜一甲第三名及第,余则邵晋涵为乾隆三十六年恩科会试第一名,然殿试在二甲第三十名。他如钱大昕、王昶、朱筠、武亿等中进士者,皆在二、三甲之列,若戴震之进士名,乃清高宗之所赐。即金榜、江德量、卢文弨,虽名在三甲,然或早退林下,或著述为业,仕宦皆不显赫,更无财富利禄之可言。

他若江永、惠栋、沈彤、余萧客、江声、汪中、江藩、臧庸等,则或屡败科场,或绝意不为时文以终其身。惠栋乡试,因用《汉书》见黜。江永乃一代

①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 24《臧玉琳〈经义杂识〉序》,第 391 页。

②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 9《答问》六,第 122 页。

③ 孙星衍撰,骈宇骞点校:《岱南阁集》,卷 1《咨请会奏置立伏郑博士议》,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61 页。

④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第 868 页。

⑤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69 页。

通儒，且其所编《乡党图考》、《四书典林》，帖括之士窃其唾余，取高第掇巍科者数百人，而永以明经终老于家。又乾隆元年举博学鸿儒科，沈彤被荐入京。全祖望评曰：“君平生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轻下笔，几几有含毫腐颖之风，予以为非场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赋至夜半，不及成诗而出。”①又胡虔记“戴东原震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钱辛楣詹事曰：‘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戴中壬午江南乡试，年四十矣。出青田韩锡祚房，其文诘屈，几不可句读。后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②清季李慈铭曾论曰：“盖汉儒之经学，为利禄之路，其从师传业者，无异今之举业。而国朝诸儒之学，则实与时背驰，宜其愈上而愈困也。”③乾嘉诸儒，虽治汉学，然与汉时学术与时代皆不相同，诸人皆注全力于经史，则场屋文字不时作，比至考场，自然生疏；又科举时文，皆须烂熟《四书》朱注之类，而诸人又不喜朱子，则其落选也必矣。

乾嘉考据学家既举业无望，则其仕途之坎坷可知，李慈铭曾论之甚详。其曰：

> 呜呼！汉人传经，时主所好，专门授业，多致通显，上为帝师，次典秘籍。故或贿改夫漆书，或争论于讲殿，桓荣以车马夸稽古，夏侯以青紫诱明经。士风景从，犹非无故。下至宋之谈礼，宗庙以为号；明之讲学，朝廷畏其党。习俗之靡，尚缘势利。若我朝诸儒之为汉学也，则违忤时好，见弃众议，学校不以是为讲，科第不以是为取。其初开国草昧，朴学椎轮，则亭林以遗民终，潜邱以布衣死。西河、竹垞，老籍词赋，暂陪承明，旋即废退。东樵献书，仍沦草莽；玉林著述，不出里闬。吴江二长，朱长孺、陈长发。鄞江二万，青衿饰终，黄馘就木。而渊源宋儒者，二曲布衣，关中讲学，亲屈万乘，宠以大儒。潜庵、松阳，互标朱、陆，生为羽仪，殁邀俎豆。安溪以其政事，缘饰儒风，揣摩当宁，宗尚紫阳，位极鼎台，久枋国政。江阴、高安，相为提挈；榕城继席，名位益隆。望溪起于俘囚，久居讲幄；漳浦擢自闲废，遂为帝师。此则汉、宋相形，遭遇胜负，已可知矣。
>
> 高宗盛时，首辟经学，荐书两上，鹤车四出。然得官者五人：顾、陈、吴、梁，仅拜虚秩；当涂入馆，更以年例。而诸公亦皆学参汉、宋，未号专家。当时海内宗师，松崖一老，征舆未上，坛席已除。都讲弟子，仲林、艮庭，槁项卒世。婺源江君，学究天人，东南两星，与惠相望，沈沦胄序，久晦少微。高弟戴、金，最为首出。檠斋得膺上弟，旋复杜门；东原晚际昌时，公车入省校书，恩例超授翰林，天不慭年，终于吉士。至于开四库，求遗书，尤国朝儒林之一大际会也。笥河发其议，晓岚总其功，东原既以兹通籍，南江复由此升庸。然两君以外，寂无徵焉。竹汀、西庄，清华通贵，而一谪九列，一终少端，皆盛年挂冠，著书林下，淡泊之操，鼎峙抱经。而歙有辅之，岱有众仲，词臣五隐，咸畅醇风，尽瘁简编，何关人事。其继掇巍科者，渊如、北江，一沈俗吏，一为戍兵，虽践金门，终饱蟫橐。吾乡瑶圃邵氏，左官投劾，声华尤闇。石渠以名臣之子，早著才称，而词曹不终，豸冠终斥。芝田、颐谷，未久西台。而懋堂、珍艺、十兰、二谷，桂未谷、武虚谷。以俗吏终矣；次仲、端临、易田、阶平，以教官终矣；溉亭、小雅、孝臣，以进士终矣；雕菰、辰叔以举人，容甫、可庵、郑堂、璞园，且以诸生终矣。笥河于乾嘉儒术为首功，而微罪贬秩，一蹶不正。其弟文正公，颇持宋学，遂跻三公。其最以儒学显用于时，河间、仪徵两文达耳。而河间毕生书馆，勤于其职，及拜协揆，逾旬而殉；仪徵历官使相，未尝一日当国，皆不能刻扬素风，汲引同类。稍得志者，惟嘉庆己未一科，仪徵主试，大兴听从，幸逢翩翩，多班玉笋，论者谓此科得人，逾于乾隆鸿博。然惟龙首姚公、探花王公文僖、文简，皆长春官。其余则恭甫一列词垣，告归不出；兰皋户部，十年不迁。皋闻始列庶常，几于废黜；周生沈于兵曹，春桥胡氏秉虔。没于郡佐。山尊稍以词章，得跻侍从，终亦不振。嗣是而降，大雅云亡。兰坡、墨庄，稍为后出，并跻馆职，未结主知，一退老于名山，一积劳于闽海。武进二申，李申耆、刘申甫。心壶、竹村，各述所传，位不称

①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内编》卷20《沈果堂墓版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本，上册，第361页。

② 胡虔：《柿叶轩笔记》，《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58册，第38页。

③ 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光绪丙子二月初五日《鹤征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6页。

学。他若匪石、涧蕡、简庄、拜经、晓楼、硕父之终身席帽,连惓牖下者,更如书中蠹鱼,听其自生自灭而已。即以吾浙言之,仁和诸赵,德清诸徐,临海诸洪,谈经之窟也。鹿泉致位八坐,帖括所传,或在人口;而谷林、宽夫、心田、筠轩诸先生,今犹有知其姓氏者耶! 嘉兴之李,次白氏贻德。仁和之二梁,谏庵玉绳、夬庵履绳。萧山之王、谷塍氏宗炎。之徐、北溟氏鲲。之汪,苏潭氏继培。上虞之王,汾泉氏煦。归安之严,铁桥氏可均、鸥盟氏杰。仁和之翟、晴川氏灏。之孙,雨人氏同元。临海之金,诚园氏鹗。此皆著述之卓然者,而乡评校议尚及其人耶! 尤可异者,萧山王氏绍兰,位望通显,罢官之后,所作满家,训义邃精,几颉惠、戴,而越人仅贵之为中丞,未尝尊之为学者。

鸣呼! 由斯以观,诸君子之抱残守阙,断断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诎,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 夫岂操戈树帜,挟策踞座,号召门徒,鼓动声气,呶呶陆、王之异辞,津津程、朱之弃唾者所可同年语哉!①

从李氏所论可知,尽管在乾隆中叶的科举考试中,对通经之士有所重视,但毕竟性理论为首选标准。清代考据学家不仅不能与汉儒较其同异,亦不能与清代尊奉宋学者比其优劣。其既出身贫贱,又不擅时文,更不善钻营,日事读书,拙于生计,则穷困潦倒也固矣。考据学虽为一时显学,但并未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裕如与富足。“著书难为稻粱谋”,方为他们一生真实之写照!

## 四、乾嘉考据学家之事功之学

古人所谓事功之学,亦称经济之学,经世济民之学。后人每谓清儒终日埋于故纸堆中以求活,于世无补,于国无益,故无事功之学。又或谓其缅颜事清,贪残污秽,了不知耻,如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斥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刘逢禄、宋翔凤诸人者然。但细考之事实,则知其说亦不然矣。今举之如下:

前已论之,乾嘉学者科举仕宦虽不如治宋学者显赫,但入中枢、统方面者,亦有其人,如纪昀、王引之与阮元等,纪氏历官至礼部尚书,其一生最重者为主持四库馆事;王引之官至礼、工、吏部尚书,为官清整,深得倚重,嘉庆帝称其“敢言人所不敢言”②;阮元历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在修政去弊,兴学育教,驱除边患,禁绝鸦片,其功甚伟。直言极谏者,莫若王念孙、洪亮吉。王氏密劾和坤,为国除奸,时人称其为“和鸾鸣凤”;洪氏《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声震中外,终遭戍边,与王氏后先辉映。他如王昶之从征西南,襄赞为多,后官刑部侍郎,熟于兵事刑法;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精于治理钱粮;郝懿行、胡培翚虽仅官户部主事,然其精于吏法,以能著称。至为州官者,有汪辉祖官道州知州,李文藻官桂林同知,汪喜孙官怀庆府知府,张澍官临江通判,朱绪曾官台州府同知,庄炘官兴安府知府,郑方坤官武定知府,胡秉虔官丹噶尔同知,胡承珙官台湾道等。为县令者,有段玉裁官巫山知县,邢澍官长兴知县,周春官广西岑溪知县,洪颐煊官新兴知县,钱东垣官上虞知县,桂馥官永平知县,武亿官博山知县,丁履恒官肥城知县等。除段氏有贪残之讥外,余皆所在有政声,多令誉,不愧清廉明正之官也。

从事文化教育之职,在四库馆中出力尤著者,则有戴震、周永年、余集、邵晋涵、杨昌霖、金榜、曾燠、任大椿、李潢、洪梧、孙希旦诸人。官至学政者有惠士奇、卢文弨、朱筠、钱大昕等。士奇在粤六年,深得人心;朱氏任安徽学政,教诸生治古学,又上疏请辑《永乐大典》,启修《四库全书》之轴;卢氏任湖南学政,以越职为学子请命而遭左迁,晚年职教书院,乐育英才;钱氏为广东学政,门下人才辈出,归里后掌教书院,地方大吏,每遇大事,辄咨询,莫不满意而去。官府州县学教职者,如凌廷为宁国府学教授,钱塘为江宁府学教授,戚学标为宁波府学教授,沈钦韩为宁国府学训导,翟灏为衢州府学教授,刘台拱为丹徒县学训导,严可均为建德

① 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同治甲子四月初二日《戴氏遗书》,第 1026—1028 页。

② 徐珂编:《清稗类钞·谏诤类·王文简谏圆明园增防事》,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重印本,第 1504 页。

县学教谕,宋绵初为清河县训导,汪莱为石埭县训导等。亦莫不振兴文教,砥砺风气,勤勤恳恳,恪尽其职矣。受朝廷征召者,如顾栋高、惠栋、沈彤之举博学鸿词,江声、陈鳣、钱大昭、胡虔之举孝廉方正,虽有中有不中,然皆学有渊源、识高品粹也。

虽仕即旋或终身不仕者,如江永之处里党,以孝悌仁让为先,人多化之。又尝劝乡人输谷立社仓,行之三十年,一乡之人不知有饥馑。余如沈大成、余萧客、汪中、汪元亮、孔广森、厉鄂、吴骞、袁廷梼、鲍廷博、黄丕列、顾广圻、钱坫、朱骏声、朱彬、江藩、章宗源、洪震煊、钮树玉、焦氏父子循、廷琥,马氏兄弟曰管、曰璐,李氏兄弟富孙、遇孙,梁氏兄弟玉绳、履绳,臧庸等,亦皆为乡里表率,士中贤人。其虽不能以经术饰吏事,所谓"以夙昔经术,发为经济,移孝作忠,为当代名臣",①然亦非消极避世也明矣。如汪中曾论其志云:"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②当时学者之心,亦多如之。

此可见,乾嘉考据学家绝非隐士,更非因惧祸而逃避现实,这其中以焦循的言行最为典型。焦氏称自己"尚论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为亲民官。虽以疾跧伏乡里,时时静察夫民之情"③。由于身体的原因,焦氏并未积极入仕,而是以多疾之躯治《易》,自称"余以病家处者十年,每莎笠短衣,与一二佃客杂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谓非尝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为隐于舟者"。④ 在谈到反对隐的理由时,焦氏说:

> 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有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称隐,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不必隐。许由、巢父、沮溺、荷蓧丈人、东郭平原、朱桃椎、仲长统之流耳,自负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巢父、许由必不能治鸿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驱猛兽、成《春秋》以惧乱臣贼子;四皓、严光必不能与萧、曹、邓、寇并立功勋。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管,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隐,不隐者也。故曰: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也!⑤

焦循以治世致用为标准,打破了以隐为高尚的传统观念,讥刺自古以来的隐逸之士是"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乾嘉学者无论仕与不仕,都反对消极隐遁,焦氏此语足以代表他们的心理。

王念孙谓"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⑥,此儒者入世之理想。然世能兼之者,则既决于其人,亦决于其时。乾嘉诸儒,处和平之世,繁盛之局,故既不能持戈跃马,立万世之功而彪炳史册;亦不能徜徉林下,托故国之思,以歆动后人。然上列诸人,居官尽职,处里必贤,较宋学人物如清初以来熊赐履、李光地、方苞诸人之假道学,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后人每谓其畏祸自全,消极避世,埋头古籍,无关民生;甚或以为其误国误民,导致晚清科技不兴,落后挨打,并戴以"落后"、"琐碎"、"务虚"、"反动"等帽子,此可谓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绳古人的典型心理。

综前所论,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与衰微,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也有其学术内部发展的自身演化脉络。在急功近利的今天,面对清代遍布南北的考据学家和他们插架森森的著作,很少有人愿意

摇摇

① 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26《味经窝类稿序》,第433页。
② 汪中:《述学别录·与朱武曹书》,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缩印本,第14b页。
③ 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集》,卷17《送吴生序》,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版《焦循诗文集》本,第318页。
④ 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集》,卷17《〈舟隐图〉序》,上册,第322页。
⑤ 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集》,卷7《非隐》,上册,第126页。
⑥ 臧庸:《拜经文集》,卷3《与王怀祖观察书》引王念孙语,《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91册,第578页。

读完一部他们的著述,在他们训诂考据的词语密林中,认真寻觅他们的思想火花与真知别解。因此,从当时至今日,虽然已经走过了近二百年的历史,但学术界仍未摆脱如江藩、方东树、皮锡瑞、章炳麟、梁启超、钱穆、陈寅恪等人的认识与评价,甚至对他们明显的误说偏见,也仍坚执为确说真解,屡屡引证,据为典要。我们认为,如果对乾嘉考据学家的思想与学术做不到梳理釐清与深入研究,则对近现代学术界的探究,也无法做到导源穷委,剖析肌理,因为近百年的学术界,与乾嘉考据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与系联。

# A New Theory of *Qianjia* Textual Criticism

Qi Yongx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摇10087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Qianjia* scholars of textual criticism all flaunted the banner of Han learning and criticized Song learning, their studies were to varying degrees associated with Song learning or had a background of it. In fact, the base on facts learning they advocated, which emphasizes textual evidences and the realistic attitude, has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t is an apriorism that is based on the worship for *LiuJing*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Han dynasty. Most of them were not expert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so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get an official rank.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write books, but the incomes were so low that they had to live a hard life. Howev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were, they did not just live a sequestered life, but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learning which was for a good cause and aimed at practical achievements.

**Key words**: *Qianjia* textual criticism, Han learning, Song learning, base on facts, the learning aimed at achievements

(责任编辑摇摇郑摇园)